

契诃夫《寄自西伯利亚》： 将西伯利亚“写入”俄罗斯

徐 乐

内容提要 契诃夫 1890 年前往西伯利亚的旅行既是个人创作危机驱动的结果，也是俄国知识分子意图在科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将西伯利亚作为一种概念纳入俄罗斯总体文化的实践。作为受过欧洲自然科学教育的俄国旅行者，契诃夫倡导用科学的方法为解决西伯利亚的社会问题积累数据和经验。在契诃夫记述西伯利亚旅行的系列特写中，“西伯利亚—俄罗斯”这一对立的空同模型贯穿始终。他特意疏漏和压缩了“人”在西伯利亚的存在，而以俄罗斯欧洲部分为标准确立了西伯利亚空间的“反常”特征，即寒冷与野蛮。旅途中，契诃夫笔下的旅行者—叙事者对西伯利亚的妇女和邮差做了前后矛盾的评价，导致作为整体的系列特写出现文本裂隙，其原因在于叙事主人公经历了更始仪式的个性转变，以新的眼光看待“西伯利亚—俄罗斯”的空间对立，并且对俄国人征服和开发异域空间提出了更高的精神要求。

关键词 契诃夫 西伯利亚 旅行书写 更始仪式 阈限

1890 年春，伏尔加河、卡马河和西伯利亚诸河流陆续解冻通航，4 月 15 日，圣彼得堡的《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报社签署了一份证书：“该证书持有者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以《新时报》记者身份被派往俄国各地和国外。”4 月 21 日，契诃夫带着这份证书与家人告别，踏上了横贯西伯利亚的 4500 俄里的漫长行程，于 7 月 11 日抵达萨哈林岛（库页岛）。他在岛上停留三个月零二天，走访各个居民点，开展紧张的人口调查工作，10 月 13 日才离开该岛。在西伯利亚旅行途中，契

诃夫为《新时报》撰写系列旅途特写《寄自西伯利亚》(*Из Сибири*)，分别从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寄回俄国，从6月到8月在《新时报》连载。这些特写一发表便引起了俄国社会尤其是西伯利亚知识阶层的浓厚兴趣；虽然文中对当地落后现象的揭露触痛了部分西伯利亚人的“爱国主义”情感^①，但契诃夫这些特写之中的批评文字仍被西伯利亚当地报纸节选、重印^②，并且得到了那些试图揭示西伯利亚真相者的赞赏：“契诃夫的描写绝对不可以用多愁善感来指责，也不可以用任何一种倾向性来指责。他只是在讲述他本人的所见和所闻，而且主要讲的是他本人所理解的东西。”^③

虽然旅行的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但一贯喜爱用戏谑方式隐藏内心的契诃夫似乎又有意无意地在一些表述中贬抑自己的西伯利亚旅行书写在政治、科学和文学上的抱负：“我这次到那儿去，深信我这趟旅行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科学都不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在这方面我既缺乏知识，又缺乏时间，更缺乏雄心。我并没有洪堡那样的计划，甚至也没有凯南那样的计划。”^④他对友人说：“请您千万不要对我的萨哈林岛之行寄托文学上的希望。我去那儿不是为了观察，也不是为了积累印象，而只不过是照一种不同于我生活到现在的方式生活半年而已。”(《契》15:33)他在笔记本里也注明不将这组特写收入生前出版的文集。根据这些材料，俄国主流学术界一般很少重视《寄自西伯利亚》的文学和政论价值，而是将其归入私人书信的范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科学院集体编撰的权威学术版《契诃夫全集》的注释者断言：“契诃夫并不认为西伯利亚特写有什么重要意义。更有可能的是，他把它们看作私人书信的替代品。”^⑤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契诃夫在写作这一系列特写时“像写私人信件一样，无拘无束，信笔写来”^⑥。

因为主题同源，研究者们往往把《寄自西伯利亚》系列特写同契诃夫西伯利亚旅行取得的另一成果旅行记《萨哈林岛》(*Остров Сахалин*, 1893)结合起来研究，而且根据契诃夫在书信里所说的“我主要是同终身的惩罚作斗争，我在这

① See Добродушный Сибиряк, “Вдоль да по Сибири”, in *Восто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No. 37 (1890), с. 7—9.

② See (безым.), “Хроника сибирской жизни”, in *Восто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No. 34 (1890), с. 5.

③ В. О—въ, “Заметки о туристах и сторонних наблюдателях сибирской жизни”, in *Восто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No. 30 (1890), с. 10.

④ 契诃夫《契诃夫文集》(第15卷), 汝龙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年, 第19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 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契》”、卷数和引文出处页码, 不再另注。

⑤ Семанова М. Л., “Примечания”, in Чехов А. П.,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В 30 т. Сочинения: В 18 т.*, Т. 14/15, М.: Наука, 1978, с. 763.

⑥ 张牧雪《因形象而生动, 因真实而深刻——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对19世纪俄国“人间地狱”的批判与揭露》, 载《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 第181页。

种惩罚里看到了万恶之源；此外我要同流放犯的法律作斗争，这种法律非常陈旧，自相矛盾”（《契》15：155），将西伯利亚的流放和惩罚制度与契诃夫探索具有全俄罗斯性质的哲学和道德问题的思考相联系，以突出东方旅行的经验对契诃夫形成自己的伦理观和价值体系的意义^①；或是把契诃夫的旅行当作具有存在主义意义的选择生活方式和寻找生活目的的行动，阐发俄国人在远东寒冷荒僻的极端条件下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努力^②；或是借助契诃夫的旅行笔记论证“俄国主题”即创造“将来的、更好的、更公正的生活”^③。这类研究基本上都基于俄国学术界把描写边区和地方生活的文学纳入总体俄国文学谱系以排斥文学研究的“地方志特色”的学术传统。^④然而，与萨义德的说法相符，俄国的东方视野“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表达了对一个与自己显然不同的（或新异的、替代性的）世界精心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是控制、操纵、甚至吞并——的愿望或者意图”^⑤。契诃夫这一系列的旅行文本绝不可以只当作一般的“私人书信”或者政论性的手稿材料来阅读，它的写作手法和编排结构是作家在科学、艺术、社会、道德、政治、法律等领域内深入思考的总结，反映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俄国旅行文学与西方旅行书写同构的一些特征。

一、西伯利亚之旅的科学抱负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既是契诃夫在文坛功成名就之际，也是他的写作进退维谷之时。彼时他刚近而立之年，不仅已发表了四百多个短篇小说和短剧，而且还在得心应手的幽默短篇体裁之外开拓空间，创作出为“大杂志”青睐的“大东西”（《契》14：281）；但1889年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和戏剧《树精》的写作过程预示着契诃夫原来储备的题材已然挖掘殆尽。与此同时，随着契诃夫在年轻一代作家中崭露头角，批评界对他的攻击也日益频繁。十九世纪末“萧条时

① See Кубасов А. В., “Сибирь и после Сибири: этический и эстет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А. П. Чехова”, in Комаров С. А., отв. ред., *Извне и изнутри Сибири: А. Чехов — А. Вампилов — В. Шукшин*, Ишим: Изд. ИГПИ им. П. П. Ерощова, 2014, с. 148—188.

② See Разумова Н. 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П. Чехова в аспект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Томск: Том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т., 2001, с. 147—228.

③ Шишпарёнок Е. В., “Онтология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 очерках А. П. чехова 《Из Сибири》”, in Собенников А. С., ред., *Философия Чехова*, Иркутск: Изд. Иркут. гос. ун-та., 2008, с. 281.

④ See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гл. ред.,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ибири*, Т. 1,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2, с. 8.

⑤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6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东》”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代”思想界的教父、自由主义民粹派批评家米哈伊洛夫斯基以契诃夫为代表的“子辈”们“未老先衰”^①而痛心疾首，随后“缺乏理想、信仰、原则、世界观”、“对社会政治问题冷漠”^②这类指责纷至沓来。批评的声音与创作的危机交织，促成了1887到1889年契诃夫在南方大草原的壮游：故乡塔甘罗格、新切尔卡斯克、罗斯托夫、兹维列沃、圣山、顿涅茨山、乌克兰（即契诃夫戏称的“果戈理的国土”[《契》14：281]）、高加索、克里米亚……契诃夫通过游历试图为自己的写作寻找新的起点，而这番漫游为后来的西伯利亚之旅树立了意义重大的地理参照。他甚至制定了更新的旅行计划：去日本、中国、科伦坡、塞得港、君士坦丁堡、敖德萨，像冈察洛夫一样环球航行。但正如普列谢耶夫所说，契诃夫“最想去的是不是国外，而是俄国的某个边区或者东方”^③，在那里，他指望能够克服精神危机，寻找新的创作动力和个人生活的突破。在私人书信里，契诃夫把去往东方的旅行与寻找“真理和不可违背的规律”和“道路”联系起来，渴望在旅程中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契》15：33），从而实现自我认识和自我定位。须知在俄国的广阔空间中“确定方向”，对契诃夫而言绝对是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详见《契》14：298）。

契诃夫的西伯利亚之行有着一个全球史语境。美国学者普拉特分析欧洲旅行者的非洲和美洲的旅行书写时，就这类文本的叙事策略写道：大航海时代之后，到十八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兴起了探查大陆深处的科学探险事业，促使整个欧洲的知识商业精英组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盟。正如基督教发动了一场全球性的宗教皈依工作一样，满怀启蒙热忱的西方科学家和探险家们也发动了一场全球性的自然编码行动，野心勃勃地对全球的生命形态进行认知和分类，试图为一切物种定位并纳入以欧洲为基础的全球统一的秩序和知识系统。^④以全球自然为认识和系统化对象的西方博物学，并非如同那些知识英雄自以为是的那样“纯洁无辜”，似乎与军事征服和商业扩张毫无关系，它实际上是“详细阐述一种合理化、抽

①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 К., “Об отцах и детях и о г-не Чехове”, in Сухих И. Н., сост., предисл., общая редакция, А. П. Чехов: *pro et contra*;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П. Чехова в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конца XIX—начала XX в., СПб.: РХГИ, 2002, с. 81.

② See Сухих И. Н., “Сказавшие «Э!»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читают Чехова”, in Сухих И. Н., сост., предисл., общая редакция, А. П. Чехов: *Pro et contra*;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П. Чехова в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конца XIX—начала XX в., с. 29—37.

③ Плещеев А. Н., “Письма Плещеева к Чехову”, in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гл. ред.,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68, Чехов, М.: Изд. АН СССР, 1960, с. 346.

④ 详见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方杰、方宸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30—40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帝》”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取、分离的理解，从而遮掩人、植物、动物之间功能和经验方面的关系。在这些方面，博物学描绘出某种全球霸权，尤其是一种以拥有土地和资源而非控制路径为基础的霸权”（《帝》：49）。

俄国的启蒙运动来自西方。十九世纪工业社会的形成时期，科学的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在俄国思想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数知识分子坚信理性、教育、进步、技术能解决几乎所有的人类问题。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观念渗透进大众意识，植物学、动物学、人种学、考古学、地质学等在欧洲迅猛发展，达尔文、勒南、斯宾塞、巴克尔、洪堡等知识名流广受推崇，这一切都深刻地改变了俄国人的思想视野和行动规模。1845年10月7日俄国地理学会（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在圣彼得堡成立，与1821年在巴黎成立的巴黎地理学会、1828年在柏林成立的德国地理学会、1830年在伦敦成立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并列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地理学会之一。俄国地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日耳曼裔博物学家和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米登多夫（Александр Фон Миддендорф）就是西伯利亚开发的热心参与者，在学会成立前也刚刚完成圣彼得堡科学院委托的西伯利亚北方考察（1843—1844），从雅库茨克经由北阿穆尔河流域到达鄂霍次克海沿岸，然后到伊尔库茨克，于1845年返回圣彼得堡。1847至1875年，米登多夫用德语撰写了四卷本《西伯利亚北部和东部游记》并在圣彼得堡出版，1860年该著开始陆续推出俄文译本，到1878年最终完成了俄译全书的出版。这套书得到了俄国最高层的多次奖赏和重视，1888年获得俄国动物学家最高奖——贝尔金奖。米登多夫在书中毫不掩饰“欧洲文明对于西伯利亚‘野蛮人的优势’”^①，叙述的核心动机是俄国人作为“文化承担者”^②，作为处在文明阶梯高处的人，应当担负起对西伯利亚当地居民的引导和批评的责任，也有权力征服这个野蛮国度并开采它的资源。此外，米登多夫还多次在首都各种正式会议和沙龙里做有关西伯利亚探险的演讲，激发了俄国公众对西伯利亚的兴趣。^③

到契诃夫前往西伯利亚旅行的时代，西伯利亚移民和苦役问题已经成为俄国

① Вайс Клавдия, “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создание образа Сибири XIX веке”, in *Сибирь: Взгляд извне и изнутри. Духовное измерени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24 – 26 сентября)*, Иркутск, 2004, http://mion.isu.ru/filearchive/mion_publications/sbornik__Sib/index.html [2019-02-15]

② Вайс Клавдия, “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создание образа Сибири XIX веке”, http://mion.isu.ru/filearchive/mion_publications/sbornik__Sib/index.html [2019-02-15]

③ See Вайс Клавдия, “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создание образа Сибири XIX веке”, http://mion.isu.ru/filearchive/mion_publications/sbornik__Sib/index.html [2019-02-17]

社会热烈讨论的话题。针对西伯利亚官员的专横霸道、流放犯和苦役犯的悲惨地位、政权对西伯利亚的肆意剥削，俄国出版物尤其是西伯利亚本地报刊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西伯利亚》（*Сибирь*）和《西伯利亚报》（*Сибирская газета*）这两份报纸因言辞过于激烈而被强制停刊。西伯利亚最具威望的政论—文艺杂志《东方瞻评》（*Восто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主编亚德林采夫因地方分立主义思想而名动全俄）在1890年2、4、5、6月连续刊登揭发当地警察和行政机关的材料，数次被当局警告。

契诃夫在踏上旅途之前，曾注意到一些关注移民事务的专门著作^①：《西伯利亚通报》（*Сибирский вестник*）在5—9月集中讨论了移民这一“整个俄罗斯生活的棘手问题”^②，同情移民在“碰运气般地”离开故土来到未知边区后独自承担的风险，他们陷入毫无帮助的境地，只能沿途乞讨，很多人不得不原道返回^③。契诃夫在《寄自西伯利亚》第一篇特写中就谈到来自俄国内地省份的移民和流放犯一路饱受折磨的状况：

我坐着轮船在卡马河上航行的时候，也见到过移民……卡马河的荒凉河岸上刮来的刺骨的寒风把他们吹得缩成一团。他的脸容表示：“我听天由命了。”他的眼睛里含着讥诮，不过这种讥诮是对他自己，对他的灵魂，对狠狠地欺骗了他的过去生活而发的……后来，过一忽儿，我们追上一批被押解的犯人……这儿离着他们投宿的村子还有十俄里路，可是等他们走到村庄，草草吃完饭，喝足砖茶，马上躺下睡觉，他们身上就会立刻爬满臭虫——筋疲力尽、一心想睡觉的人的最凶恶的和不可战胜的敌人。（《契》13：5）

契诃夫在去西伯利亚之前给当时的密友苏沃林写信，罕见地吐露心声，解释他为何甘冒肺结核恶化的风险做实地调查：虽然俄国社会已经意识到西伯利亚苦役的残酷、荒谬，但仍未对这一制度进行深入反思，要么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维持法律和制度所必须采取的手段，要么简单地把责任统统推到“红鼻子的狱吏身

^① See also Григорьев В. Н., *Переселения крестьян Рязан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М.: Изд. ж. «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1885; Дедлов (Кигн В. Л.), *Переселенцы и новые места. Путевые заметки*, СПб.: Изд. М. М. Ледерле, 1894; Серповский Н. Г., *Пере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 древнее и новое время и их значение в хозяйстве страны*, Ярославль: Типо-лит. Г. В. Фальк, 1885; Телешов Н., *За Урал. Из скитаний по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Очерки*, М.: Тип.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И. Д. Сытина», 1897.

^② Постороний, “Русская жизнь”, in *Сибирский вестник*, No. 96 (1890), с. 2.

^③ See (безым.), “Русская жизнь”, in *Сибирский вестник*, No. 111 (1890), с. 1—2.

上”——总之，对所有这些在冰天雪地中饱受折磨与凌辱的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契诃夫则断言“该负责的不是狱吏，而是我们全体，然而我们对这种事却不闻不问，对它不感兴趣”（《契》15：20—21）。在对萨哈林岛的调查中契诃夫发现，所谓“红鼻子的狱吏”实际上只是人们幻想出来的替罪羊，真正施行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的正是“身穿崭新的文官制服的年轻知识分子”^①，那些“把自己称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人”^②，正是他们循规蹈矩的工作使得俄国流放犯和拓殖者在边区的劳动条件更加恶化。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在解决任何问题时总是求助于现成的规则，而不愿做深入的科学研究和亲身考察。契诃夫认为，知识的获取、积累和验证需要个人独立的思考、自由的气魄、主动的精神和一套科学方法。在第七篇专门论述西伯利亚惩罚制度的特写中，契诃夫提出“要用一种比较合理、适当的正确的方法”来代替惩罚的终身性，可是知识和经验的欠缺使得俄国官方尝试改善的任何努力都没有成功，只导致走极端和犯下更严重的错误。契诃夫总结说：“凡是不以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创举，命运往往如此。”（《契》13：28）

作为一名曾在莫斯科大学接受过专业医学教育的医生，契诃夫一直对建立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自然科学方法情有独钟。对于契诃夫与科学这一主题，俄国学术界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便开始着手研究。^③契诃夫本人晚年时也总结过科学方法对自己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熟悉自然科学，熟悉科学方法，让我始终保持警惕，凡是可能的地方我总是极力依据科学资料考虑事情，凡是不可能的地方我就宁可一点也不写。”（《契》16：252—253）他特别强调与思想倾向相比，“达尔文的方法”更重要：“重要的倒不在于……有明确的见解、信念、世界观（在现代，这些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重要的在于……有方法；对于从事分析工作的人来说，如果他是学者或者批评家，方法就是才能的一半。”（《契》14：319）此处提到达尔文的名字并非偶然，须知达尔文的环球旅行的意图正是力求在事实观察、逻辑分类和科学统计的基础上建构解释世界的理论，而欧洲的东方学家们对这种理论的运用强调了西方科学文化，尤其是博物学和统计学对活生生的现实的支配地位和编码的权威性，此时的理论任务就是“为世界提供知识”（《东》：189）。契诃夫在许多作品里表现出对研究世界的科学——统计学方法的浓厚兴趣（如《统计》[1886]、

^① 别尔德尼科夫《契诃夫传》，陈玉增、邢淑华、傅韵秋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8页。

^② Катаев. В. Б., Чехов плюс... :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приемники.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 с. 66.

^③ 详见徐乐《契诃夫的启蒙观》，载《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0期，第129页。

《薇罗琪卡》[1887]、《醋栗》[1898])，他去萨哈林岛所做的人口调查采用的也正是统计学和分类学方法，回来后撰写的《萨哈林岛》一书无论有多么强的艺术性，其写作动机和基础都是用统计学方法来调查真相。契诃夫在一份送呈官方的信函中郑重写道：“我打算抱着科学和文学的目标到西伯利亚东部去。”(《契》15: 4)这绝非玩笑之语。他前往西伯利亚，根本意图是以科学的方法观察和揭示在俄国人心目中如同地狱般的北境王国的真实面貌，为探索制度改良积累专业知识和调查数据。这与十八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探险家们的旅行书写中对全球自然进行分类和系统化的统计学描述机制，具有不谋而合的同构性。

在踏上西伯利亚土地的前一年，契诃夫在《新时报》上发表文章悼念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利斯基。这篇著名的政论文中，契诃夫批判了笼罩着俄国欧洲部分的慵懒、沉闷的病态气氛：人们丧失信念，缺乏生活目标，闲散放纵。与之相对，契诃夫高度赞扬像普尔热瓦利斯基这样的杰出学者，赞赏“他们的思想原则性，以国家和科学的荣誉为基础的高尚抱负，他们的顽强精神，为任何困苦、危险、个人幸福的诱惑所不能战胜的对既定目标的追求，他们知识的丰富和劳动的辛勤，对炎热、对饥饿、对故乡的思念、对折磨人的热病的习以为常，他们对基督教文明、对科学的狂热的信心”(《契》13: 411)。思想原则、国家荣誉、知识、劳动、顽强进取、冒险精神、对个人幸福的弃绝、对故乡的思念、基督教、科学，契诃夫在此并列的既有个人品质和学术兴趣，也有国家利益和欧洲文明，这些价值元素被俄国作家编织成固定的话语体系，构成了普尔热瓦利斯基或英国冒险家斯坦利这类“建功立业者”在深入东方进行探险活动时体现出的“最高道德力量”。在这当中契诃夫又独独看重科学的正当权力，断言“科学是像恺撒的妻子一样不应该受到怀疑的”(《契》: 14: 615)。然而，科学研究的目标看上去与暴力和专横毫无干系，但实质上“受制于其与政治权力、学术权力、文化权力、道德权力之间的交换”(《东》: 16)，为俄国人吞并这块东方土地提供了理由。

《新时报》的主编苏沃林曾是一位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记者，但按照列宁的说法，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他“投靠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堕落到向当权派卑躬屈膝的地步”^①。结识契诃夫时，苏沃林在俄国思想界已经声名不佳，但依然被帝国利益的辩护者们所看重，《新时报》的撰稿人、俄国著名思想家罗赞诺夫把苏沃林的效忠权力夸赞为“为了祖国的福利而自我牺牲的英勇行为”：

^① 转引自屠尔科夫《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朱逸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8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安》”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契诃夫《寄自西伯利亚》：将西伯利亚“写入”俄罗斯

“他穿上灰色的士兵大衣……去进行艰难的远征，俄罗斯走到哪里，他也就走到哪里。”（《安》：60）而契诃夫则跟随俄罗斯的脚步走到了西伯利亚，为苏沃林雄心勃勃的政治和文学蓝图填补空白。虽然对苏沃林十分强硬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观念持有异议，但契诃夫仍十分看重此人身上的启蒙光环：“由于您称道德国的文化，强调普及教育，您日后是会进天堂的，而我也因此尊敬您。”（《契》14：602）此处提到德国并非偶然，后来契诃夫针对德国文化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关系论证说：“它〔德国〕又有科学，又有爱国心，又有优秀的外交家，要什么有什么。它打败了法国……”（《契》14：616）关于引入充满男性的征服力量的“日耳曼主义、德国哲学和科学的权威”对俄罗斯人培养独立精神和确立自己世界领袖地位的意义，别尔嘉耶夫做过形而上学的论述^①，这与契诃夫从科学和实践角度所做的判断恰好吻合。

英国学者巴辛在研究俄国民族主义想象与远东地理形象的关系时写道：“研究社会如何认识、思考和评价不熟悉的地方，是研究社会或者它的部分如何认识、理解和评价它们自身的颇有成效的路径。”^②在他看来，欧洲人越出其边境的探险和殖民活动，一方面制造出一个地理的他者形象，另一方面在这个非欧洲的、被朦胧感知的世界里表达自己的乌托邦希望和对宗主国令人失望的现实的批判，这两点使得西方旅行书写不可避免地将地理上的他者编进“欧洲帝国想象的更加宏大的意识形态网络”^③中。契诃夫以西伯利亚苦役生活为参照，希望促进身边的俄国人认清自己的懒惰、冷漠和所谓“文明世界”的种种社会问题，这些动机一直在契诃夫的文学创作中强有力地跳动着，“萨哈林的气息”洋溢在他的《第六病室》（1892）等几乎所有名作中。当代契诃夫学家屠尔科夫说“现在契诃夫在所有的地方都看到萨哈林，它透过平常的生活现象显示出来”（《安》：184），并且把《三姊妹》（1900）所生活的俄国外省环境称为“一切都萨哈林化了的生活”（《安》：417）。卡塔耶夫在1995年西伯利亚出版的《萨哈林岛》单行本前言中亦指出，萨哈林如同一滴水“映照出整个俄罗斯”，“萨哈林的谬误并非什么例外，而是俄罗斯的谬误”，“萨哈林人也是俄国人”。^④

^①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6页。

^② Mark Bassin, *Imperial Visions: Nationalist Imagination and Geographical Expans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1840–18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74.

^③ Mark Bassin, “Inventing Siberia: Visions of the Russian East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 (1991), p. 764.

^④ See Катаев В. Б., “Сахалин и вся Россия”, in Чехов А. П., *Остров Сахалин: (из путевых записок)*, Южно-Сахалинск: Сахал. центр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1995, с. XIII, с. XIV.

二、对立空间的界限与跨越

将西伯利亚视为与俄罗斯具有同构性的文化空间，并因此将“萨哈林人”体认为“也是俄国人”，表现出从契诃夫时代到今天俄罗斯人理解异域空间时采取的中介类型，用萨义德的话说就是：“这一类型使人们将新事物，第一次看见的事物，视为以前认识的事物的变体。这样一种类型本质上与其说是接受新信息的方式，还不如说是一种防止人们对已经形成的看法提出质疑和挑战的方式。”（《东》：74）事实上，长久以来西伯利亚不但远离俄国文化中心，而且也不属于俄国外省范畴。西伯利亚从“无边无际的国度”和“一无所知的土地”变成俄国地理和历史空间的一部分，反映了与帝国行政建设平行的、在词语上占领新领土和理解新领土的过程。随着俄罗斯帝国东方边界的扩展，也伴随着内部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无边无际”的“大西伯利亚”领土被逐渐分割出来，并入了俄国核心版图。1805年，派往中国（但被清政府拒绝入境）的俄国使团成员维格尔（Ф. Ф. Вигель）断言：“对于 [人口数量] 迅速增长的俄国居民而言，西伯利亚作为巨大的土地储备是有益于俄国的，随着移民的进程，西伯利亚将缩小，而俄国必将扩大。”^①

可是，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卡拉姆辛在著名的俄罗斯国家史中仍不带主观评价地把西伯利亚记录为“北部亚洲的无法估量的空间，四周被岩石地带、冰海、东方大洋、阿尔泰山脉和萨彦山脉包围”，与地缘上的隔绝相应，这片广阔地域尚未进入人类文明史，“隐藏在古代宇宙志学家的好奇心之外”；而西伯利亚的历史始于西方遭遇的东方威胁：“在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入侵欧洲前，历史对西伯利亚毫无记载。”^②从更深层的文化视角来看，俄国人与其说是在抱怨这个边区的野蛮荒凉，不如说是把它理解为世界边缘和时间尽头。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著名的改革家斯佩兰斯基在1819—1821年间担任西伯利亚总督，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履职看作向东方的推进，而是说成从上往下的降落，如同堕入地狱。他在给自己的同道斯托雷平写信时说：“我越往西伯利亚的底部下沉，越是看到更

^① Qtd in Дамешек Л. М., Ремнев А. В., отв. ред., *Сибирь в соста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7, с. 17.

^② See Карамзин Н. М.,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 3 кн.*, Репринтное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изд. 1842—1844 гг., Кн. 3. М.: Книга, 1989, с. 219.

多的恶，而且是令人发指的恶。”^①

苦役、流放、荒凉、严寒、与俄国文化中心的隔绝、社会治理的混乱和官员的腐败，所有这些地缘政治的、文化历史的和自然的因素相互叠加，使得西伯利亚在俄国人的意识中幻化为一幅人间地狱的可怕图景，尽管他们可能从未踏足过这片土地。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即将被处死的诗人雷列耶夫在长诗《沃伊纳洛夫斯基》（1823—1824）中，便如此描绘威胁着自己和友人命运的西伯利亚：

这片国度的阴森的大自然
永远严酷和野蛮；
愤怒的河流在咆哮，
恶劣的天气在肆虐，
阴云终年密布。^②

此后，在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格列勃·乌斯宾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柯罗连科直到契诃夫等十九世纪经典作家笔下，西伯利亚空间象征着俄罗斯国家权力的皮鞭，时时刻刻威胁着各个等级的臣民，而那些走进西伯利亚土地的人则仿佛落入地狱，与死亡无异。在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妇女》（1872，1873）两部曲中，当十二月党人妻子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和沃尔康斯卡雅公爵夫人毅然放弃贵族特权，追随丈夫奔赴西伯利亚时，人们把她们都已看作死人：“公爵夫人身穿一色的黑服，/独坐车中，脸色苍白得像个死人……”；“我的亲人们严肃地沉默不语，/别离竟是这样黯然无声。/我想：‘对家庭来说，我已经死去……’”^③对于契诃夫而言，西伯利亚之旅不啻一场生死考验，他动身前写信说：“过几天我就要离开俄罗斯本土很久，说不定就此不回来了。”（《契》15：40）当他不顾一切走上西伯利亚大道时，人们都带着怜悯的神情瞧着他，“仿佛瞧着一个死人似的”（《契》13：32）。俄国与西伯利亚仿佛是被鸿沟隔开的两个决然不同的空间，一边是“自己的”，与家乡、生活、文明、秩序相联系；

^① Qtd in Анисимов К. В., отв. ред., *Сибирский текст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сюжет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М.: ФЛИНТА, 2014, с. 5.

^② Рылеев К. Ф., *Войнаровский*, http://az.lib.ru/r/ryleew_k_f/text_0010.shtml [2019-02-18]

^③ 《涅克拉索夫文集》（第3卷），魏荒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213、279页。

另一边是“陌生的”，充满了敌意和恐怖，令人产生被弃绝之感。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跨越乌拉尔山，在文本记载中都会被渲染上特殊的情感，似乎此行不只是走进未知的地理空间，而且是落入一种非人的生活境遇。乔治·凯南如此描写流放犯在“欧洲—亚洲”界标旁告别祖国跨入西伯利亚地界的戏剧性场景，证明这两个空间的本质性隔绝：“一些人痛不欲生，另一些人安慰他们，有些人双膝跪地，脸贴在故乡土地上，取一撮土随身流亡，还有些人背对欧洲方向倒伏在冰冷的砖石界标下，仿佛在吻别欧洲所象征的一切。”^①

俄国文化学家洛特曼在他研究文化类型学的著作中指出，为文化空间奠定基础的是“边界”，它把文化空间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内部空间是封闭的，填充它的是各种观点的有限群，而外部空间则是开放的，因此把‘内—外这一对立阐释为‘有组织（拥有结构）—无组织（没有结构）’这一对立的空记录，就是十分自然的事。”^②人总是先在地存在于一个空间中，总会把自己生活的地方视为有着固定观念的“内部空间”，即“自己的、熟悉的”空间，而后来不断扩大视野和行动范围的过程，也是不断为自己设立内外边界的过程。内部空间始终起主导作用，为改造混沌形成秩序提供结构规则和价值判断，而被放在边界之外的遥远土地则属于外部空间，即“异己的、陌生的”^③空间，是对立两项中的弱项，是被窥视和征服的对象。来自内部空间的旅行者观察、研究外部空间，并在意识中组织它，赋予它结构。用萨义德的术语来说，描述异类空间的文本，与写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形成了一套可供分析的结构，这一结构在时间、话语和公共机构中的反复出现，赋予文本以权威和力量；这种权威的前提即是描述者的“外在性”，也就是旅行者从被描述的空间之外表述它，代替它说话，展现它的异类情调和神秘色彩，供自己的读者“仔细观察、研究、判断、约束或者管制”（详见《东》：27—50）。也就是说，从内部空间到外部空间的旅行者实际上扩大了两个空间的差异，甚至想象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跨越边界则是旅行者拥有的强势地位所赋有的特权。

在契诃夫的系列特写中，旅行者渡过的河流具有现实地分割内外两个空间、使人处于过渡状态并且施加生死考验的功能，使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① Кеннан Д., *Сибирь и ссылка: Путевые заметки*; В 2 т., пер. с англ. Богданова И. А., Т. 1, СПб.: Рус.-Балт. информ. центр БЛИЦ, 1999, с. 110.

② Лотман Ю. М.,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В 3 т., Т. 1, Таллин: Александра, 1992, с. 393.

③ Лотман Ю. М.,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В 3 т., Т. 1, с. 394.

伴随着征服的成长历史及与故乡的隔绝，这种经历类似但丁《神曲》中渡过冥河拜访地狱的场景^①。在欧亚大陆上长度超过 1000 英里的 33 条河中，有 14 条位于西伯利亚，其中包括在俄国流量最大、长度世界排名前十的四条大河——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阿穆尔河（黑龙江）。西伯利亚水资源丰富，但作为主要水路干线的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以及它们的支流均由南向北纵向流入北冰洋，并未给自西而来的俄国殖民者提供交通便利，反而将西伯利亚土地横向切割开来，阻碍了俄国欧洲和亚洲部分的人员和物资往来。此外，西伯利亚通向北方的排水受到向东撤退的大陆冰蚀的干扰，造成地表过度潮湿。契诃夫在西伯利亚艰难跋涉的那个春天，各条向北流淌的河流的上游（南端）已经解冻，但下游尚处在冰期，因此无法顺畅地排水，引发了大范围的洪水泛滥。在这种情况下，渡河常常威胁到旅行者的生命安全。恶劣的交通状况让契诃夫一度对冈察洛夫在西伯利亚旅行时抒发的民族乐观主义表示怀疑：“一年四季，这条路始终使人受不了：春天是烂泥，夏天是草丘、深坑、修理，冬天是坑坑洼洼……不错，就连当代的作家也赞赏西伯利亚行车的疾速，不过这只是因为既然到过西伯利亚，不经历一下疾速的行车就不像话，虽然这种经历只是在想象中而已……”（《契》13：39）春季洪水泛滥在西西伯利亚尤其严重，那里的低地略微向中心倾斜，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沼泽——十万平方英里的瓦休甘尼耶。契诃夫的系列特写终止于叶尼塞河，正是这条河把西伯利亚分成东西两半。十二月党人罗增男爵发现：“东西伯利亚多山，河流密布，河水源自阿尔卑斯山，河面有雨燕飞翔，水流明净清澈；西西伯利亚地势平坦，河水流速缓慢，令人产生怠惰和阴森之感。”^②叶尼塞河标志着西伯利亚地形的骤然改变，也让旅行者—叙事者脱胎换骨般重拾启蒙的信心和国家主义的激情：

如果路上的风景在您并不是无所谓的事，那么乘马车从俄国到西伯利亚的一路上，您从乌拉尔起一直到叶尼塞河止都会感到乏味。寒冷的平原、歪斜的小桦树、水洼、某些地方的湖泊、五月的雪以及鄂毕河支流的荒凉萧索的两岸，总之最初的两千俄里行程在记忆里能够保留下来的只有这一点而已。至于为异族人崇奉而为我们的逃亡者所看重并且日后会成为西伯利亚诗

^① See Баханек С. Н., “А. П. Чехов — драматург на пути к циклу очерков «Из Сибири»”, in Комаров С. А., отв. ред., *Извне и изнутри Сибири: А. Чехов — А. Вампилов — В. Шукшин*, с. 136.

^② Розен А. Е., *Записки декабриста*, Иркутск: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84, с. 277.

人取之不尽的金矿的大自然，新奇、宏伟、瑰丽的大自然，那却是从叶尼塞河才开始的。（《契》13：40）

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并没有把他在旅途中征服的每条河流都记录在案，例如对宏伟的鄂毕河只是顺便提及，但他挑选出加以描写的四次渡河场景无不具有强烈的神话象征和历史文化涵义。第一篇特写记载他渡过的第一条河，虽是一条不知名的河，却如同但丁《神曲》中分割生死的冥河阿刻隆河一样，构成了西伯利亚—俄罗斯两个世界——黑暗王国和光明王国——的分界。在昏暗的天色中，叙事者看不到对岸，只觉得“河上的潮气吹来，人的两条腿变得冰凉，后来周身都冰凉了”；河水是“乌黑、严峻的”，而笼罩在这条河上的，是“沉闷的、坟墓般的寂静”（详见《契》13：6）。这条河上的渡船工人原来是被流放的人，他们“已经变得完全麻木不仁……白日黑夜地在寒冷的水面上来来往往……永远丧失了他们原有的一切热情……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已经不是人，而是野兽了”（《契》13：7）。见到旅客后，他们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恶毒地咒骂，这令人想起但丁去往地狱的路上所遇见的卡隆，那个“铅灰色的沼泽上两眼辐射着愤怒的火焰的船夫”，他一见到来等待渡船的鬼魂便叫道：“罪恶的鬼魂们，你们该遭劫了！再也没有希望见天日了！我来把你们带到对岸，带进永恒的黑暗，带进烈火和寒冰。”^①契诃夫第一篇特写也以关键词“地狱”结尾：“他们就是到了来世，也会遭殃：他们会因为犯罪而下地狱。”（《契》13：7）第一次渡河完全可以在象征层面上类比为下沉到地狱，而且整个系列特写的篇目数量也遵循但丁的九层地狱构造，同样有九篇^②。

第二次渡河经历记载在第四篇特写里，这一次是额尔齐斯河。连绵的雨水导致河流泛滥淹没大片草地，为通篇特写营造出阴沉压抑的气氛：“天上刮起刺骨的寒风，开始下雨了，这场雨日夜不停地下。”（《契》13：17）这里又一次应和了但丁笔下的地狱景象：“这里下着永恒的、可诅咒的、寒冷的、沉重的雨；降雨的规则和雨的性质一成不变。”^③如果说第一次渡河除了烘托氛围外并未描写具体的地理环境，因此只构成旅行者—叙事者有关地狱的本体论观念的隐喻，那

^① 详见但丁《神曲·地狱篇》，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8页。

^② See Кубасов А. В., “Сибирь и после Сибири: этический и эстет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А. П. Чехова”, in Комаров С. А., отв. ред., *Извне и изнутри Сибири: А. Чехов — А. Вампилов — В. Шукшин*, с. 154.

^③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41页。

么在后一次渡河时，旅行者—叙事者的视野扩展到了地理学：“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一个辽阔的湖。这就是被水淹没的草地……时而这儿，时而那儿，露出小岛和还没有淹没的长条土地……湖对面，远处，伸展着额尔齐斯河的一带高岸……额尔齐斯河辽阔……对岸又高又陡，十分荒凉，可以看见一条山沟……这条山沟里有一条路通到……普斯丁诺耶村。”（《契》13：19—20）额尔齐斯河的春季泛滥给渡河人造成“该诅咒的印象”，同样引起死亡和地狱的联想：“只有癞蛤蟆和大罪人的阴魂才会在这种地方生存。额尔齐斯河不是在喧嚣，也不是在咆哮，却好像是在敲打河底的棺材。”（《契》13：20）在此，现实的地理和神话的观念彼此交融，同时得到了历史潜文本的深化，作者只用一个历史细节便把俄国民族的历史记忆引入了“十分荒凉”的西伯利亚空间：“额尔齐斯河辽阔。要是叶尔马克在春汛时期游过这条河，他就是不穿锁子甲也会淹死。”（《契》13：20）从这段话里可以察觉到契诃夫的意图：在观察、经历西伯利亚这一异域空间时，引诱读者感受、想象俄国人征服史上那起里程碑事件——叶尔马克率哥萨克部队进军西伯利亚汗国为沙皇扩张领土。叶尔马克夺取西伯利亚的事迹在他死后很快出现在史诗中，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在感怀诗《叶尔马克之死》（1821）中将这个主人公和他的手下表现为民间壮士歌中的勇士。通过口头和书面文学的流传，叶尔马克英雄崇拜已然深入俄国人的感情。二十世纪苏联学界的西伯利亚史书依然赞颂叶尔马克“为把西伯利亚并入俄罗斯国家，为俄国居民后续广泛的经济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①。2004年俄罗斯出版的齐保鲁哈的《征服西伯利亚：从叶尔马克到白令》则直接指出叶尔马克对于俄国向东方扩张领土和殖民掠夺亚洲自然资源的意义：“叶尔马克和他的哥萨克部队为俄罗斯人民开辟了一条迎着太阳通往东方的道路。循着叶尔马克他们的足迹踏上征途的有新土地发现者——哥萨克，俄罗斯实业者——猎人和捕兽人、商人，最后还有农民——庄稼人。”^② 追随着叶尔马克的脚步来到西伯利亚的俄国人，还有与前文中契诃夫热切悼念的普尔热瓦利斯基并肩为帝国开疆拓土的探险家们，他们是为欧洲文明建立“丰功伟绩”的科学“战士”，而与普尔热瓦利斯基和叶尔马克一样，这些战士也往往毙命于远离故土的异乡荒漠。

记录第三次渡河经历的第六篇特写篇幅最短，却是整个特写系列中最紧张、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旅行者—叙事者与其他渡河人一道，真实地与死亡擦肩而

^① Бояршинова З. Я. , ред. ,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 Томск: Изд. Томск: ун-та, 1987, с. 101—102.

^② 齐保鲁哈《征服西伯利亚：从叶尔马克到白令》，杨海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93页。

过：他们调动起全部的精神和身体力量，与泛滥的河水、大风、浪头、雨、雪斗争，并且最终赢得了胜利——跨越了空间的分割。在这次渡河的同船人中，契诃夫挑选出一位邮差和一个小兵加以描写，前者是个“上了年纪的高个子”，随身带着“二十普特重的邮袋”，后者则“满脸雀斑。他的军大衣简直拧得出水来”。渡船行至一半，“河水变得更黑，大风和雨水扑打着我们的身子，河岸却依然离得很远，在急难时刻可以抓住不放的柳丛却落在后头了”，在这与死亡最贴近的时刻，每个渡河人都达到了生命的极限：“我看见那个小兵的脖子突然涨红了。我的心变得沉重”，唯独“邮差生平阅历丰富，这时候沉默不语，一动也不动，仿佛凝固了似的”（详见《契》13：26—27）。契诃夫没有用登上彼岸结束渡河，而是表现人的心境从沉重到欢乐的转变：“我心里的石头渐渐落下去了，等到离岸只有三俄丈左右，我就忽然感到轻松，快活。”（《契》13：27）俄国学者拉祖莫娃评论契诃夫这一次渡河经历时说：“经过与死亡的接触，实现了精神和物质的动态综合、生命的最大程度的完整、和谐。”^① 小兵形象的特写并非偶然，作为一个尚不合格的“战士”，他被放置在“阅历丰富”的邮差身边，经受了死亡的考验。他将来有可能成长为在西伯利亚建功立业的真正“战士”，而他那件被河水淋湿的军大衣（代表帝国武力规训的制服）无疑令人想起叶尔马克溺亡时所穿的沉重甲冑（由沙皇赏赐）。

第四次渡过的河流便是前文说过的将西伯利亚分为东西两半的叶尼塞河。如果说之前的河流让旅行者看到的是黑暗、寒冷、死亡的威胁，那么叶尼塞河则让他产生了光明和乐观的思想，而正因为有了思想，人才能与这条拥有无限力量和前景的大河相提并论：“我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想法，它们混在一起，互相拥挤，像叶尼塞的河水一样。”（《契》13：41）旅行者以“欧洲人的改良之眼”（《帝》：79）观看叶尼塞河畔宏伟壮丽而又未经人类社会组织的自然之美，并对比已经得到俄国殖民改造的高加索（契诃夫在中篇小说《决斗》[1891]里表明，随着俄国上流社会的文明植入，“高加索”这个概念已经失去了特殊的民族文化含义^②），为西伯利亚设置了俄国文明指导下的美好未来，从而将时间意义投射进无限的空间想象：“对岸山峦起伏，使我联想到高加索，也是那么烟雾迷漫，使人沉入幻想，我站在那儿暗想：日后会有多么充实、明智、勇敢的生活使得两岸

^① Разумова Н. 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П. Чехова в аспект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с. 170.

^② 详见徐乐《高加索的枪声——莱蒙托夫和契诃夫笔下的两场决斗》，载《俄罗斯文艺》2014年第3期，第106页。

契诃夫《寄自西伯利亚》：将西伯利亚“写入”俄罗斯

大放光彩啊！”（《契》13：41）不过，西伯利亚未来的种种可能性，起点必然是俄国欧洲部分的现状，为此作者用俄国读者熟悉的伏尔加河来对比叶尼塞河：

我倒不是想说些话来得罪伏尔加河的热烈崇拜者，可是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比叶尼塞更壮丽的河。就算伏尔加河是一个盛装、温雅、忧郁的美人吧，而叶尼塞河却是一个强有力的、狂热的、不知该怎样处置自己的力量和青春的勇士，在伏尔加河上，人先是心情豪迈，最后却以一种被称为歌曲的呻吟结束；人的灿烂的、黄金般的希望换成一种通常称为俄国的悲观主义的虚弱；可是在叶尼塞河上，生活却从呻吟开始，而以我们在梦里都见不到的豪迈结束。（《契》13：40）

此处的“歌曲的呻吟”是一处隐藏的互文，源自涅克拉索夫的诗《大门前的沉思》（1858）：

走上伏尔加河畔：在伟大的俄罗斯河上，
那回响着的是谁的呻吟？
这呻吟在我们这里被叫作歌声——
那是曳着纤索的纤夫们在行进！……
伏尔加！伏尔加！在春天涨水时期，
你横扫田野，茫茫无际，
但怎比得人民巨大的悲哀，
到处泛滥在我们这辽阔的土地——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呻吟……唉，可怜的人！^①

与俄国欧洲部分残酷的农奴制压迫相比，西伯利亚没有农奴制和与之相关的丑恶现象，同时还提供了大量肥沃的土地。完成了渡河的旅行者的眼光在叙事进程中扩展开来，既涵盖了“西伯利亚—俄罗斯”的广阔空间，又获得了与整个俄罗斯民族历史的关联，把开发和改造西伯利亚与俄国人民摆脱奴役的未来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十八世纪俄国的天才启蒙者罗蒙诺索夫曾断言“俄国的强盛有赖于

^① 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文集》（第1卷），魏荒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371—372页。

西伯利亚和北冰洋”^①，1791年拉吉舍夫在从托波尔斯克发出的书信中感叹西伯利亚“将在世界编年史上扮演伟大的角色”^②，而赫尔岑的期待则是，一旦“阿穆尔河口开辟了航道，美国与西伯利亚在中国附近相会”，那时“太平洋是未来的地中海”^③。在经历跨越生死的数次渡河之后，契诃夫的科学信念不但没有被磨损，反而因补充了亲身的经验而愈发坚定，且与激发阅读欲望和想象的渲染着千难万险的文学叙事发生了紧密的交织，而文学的想象与科学的抱负反映着彼此的力量并互相提供合法化依据。在这种辩证关系下，原来内外空间的对立、二者最后融合的俄罗斯文明的光辉愿景，似乎不过是科学理论运作的结果，因此契诃夫关于“美人和勇士”的罗曼蒂克式联想，采用的是所谓“反征服”（详见《帝》：11）的表征策略，即在超越具体利益的范围之外，将历代思想精英绘制的以俄国为主导的宏图霸业，转化为西伯利亚与俄国欧洲部分温情脉脉的乌托邦联姻。

三、西伯利亚空间的“反常”特质

在契诃夫的西伯利亚系列特写中，开篇第一句便来自俄国的旅行者—叙事者的问话：“为什么你们的西伯利亚这么冷？”（《契》13：3）这句话透露出强大的文本立场，在整体上塑造出“西伯利亚—俄罗斯”这一贯穿始终的空间模型，并且规定了叙事者最基本的内心冲突：世界被分成两个独立自主的部分，其中的一个是标准，因为它构成叙事者和《新时报》读者所熟悉的欧洲生活；而另一个是旅行者当下直接面对的西伯利亚生活环境，它与欧洲人的心性格格不入，而且似乎充满了敌意。随后叙事者展开了比较：“现在已经是五月了，在俄国，树木苍翠，夜莺欢唱，在南方，金合欢和丁香早已开花了，可是此地，在秋明到托木斯克的大道上，却是土地棕黄，树木光秃，湖面上是混浊的冰，湖岸上和山沟里还铺着雪。”（《契》13：3）这段话中使用“已经”（уже）、“早已”（давно）、“可是”（а）、“还”（еще）这一系列转折副词，突出“你们的”西伯利亚与俄国截然不同的气候面貌，既确立了旅行者—叙事者对于西伯利亚人的“外部”位置，又以冰和雪的寒冷意象

① Ломоносов М. В., “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разных путешествий по северным морям и показание возможного проходу Сибирским океаном в Восточную Индию”, https://www.booksite.ru/fulltext/russ_america/02_28.htm [2019-05-20]

② Софронов В. Ю., Боркова Е. 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в письмах 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А. Н. Радищева. (Сибир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http://zaimka.ru/sofronov-radischev> [2019-05-25]

③ 详见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定义和解释后者的“反常”。

西伯利亚地处高海拔和高纬度的位置，南高北低，东部山脉和中部高原既挡住了来自北太平洋的温湿空气，也将印度洋上的亚热带气团拒之门外，同时寒冷干燥的北极风却可以从北方长驱直入。另外，为俄国的严寒气候起到主要缓和作用的来自北大西洋的西风带，在经由波罗的海或巴伦支海走廊抵达西伯利亚后，已是强弩之末，与此类似的是，保持俄国欧洲部分的北极海岸气候温和的北大西洋暖流，在穿过喀拉海口抵达西伯利亚海岸后也消散殆尽。所有这一切归结为一句谚语：在西伯利亚“十二个月都是冬季，剩下的都是夏季”。极寒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山间盆地达到顶峰，那里的气温据记录曾达到地球上除南极洲外的最低气温即零下 71 摄氏度，冬季，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平均温度也低至零下 20 到 40 度之间。夏季西伯利亚与乌拉尔山以西地区同样温暖，但时间短得多。西伯利亚不冻期为 50 到 100 天，俄国欧洲部分则是 75 到 200 天；乌拉尔山以东的河流结冰期超过半年，乌拉尔山以西河流结冰期少于半年。西伯利亚极度的寒冷让欧洲来客闻之色变，用法国记者古斯丁的话说，西伯利亚“冬季的漫长和凛冽让我们觉得这块地区有违生活常理”^①。1890 年春天契诃夫穿越西西伯利亚时，恰逢当地自 1842 年以来最阴冷多雨的春季^②，特写中的一位老人说：“今年春天冷得很，这是很久以来没有过的情形了。”（《契》13：14）

契诃夫在特写中强调严寒破坏了人的生活，对于普通农户而言，严寒束缚了他们的活动能力和生活要求：“当地的农民有九个月不能脱手套，不能舒展开手指头：时而是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时而是方圆二十俄里的草地被水淹没，然后来了短暂的夏天，他们工作得腰酸背痛，筋疲力尽。”（《契》13：13）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严寒让他们加倍感受到身处异国他乡的痛苦：“他们生活得乏味。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同俄国相比，他们觉得单调，贫乏，寂静无声，到耶稣升天节天气仍然严寒，到圣灵降临节下起湿雪来。”（《契》13：30）在同期所写的私人书信里，契诃夫补充了更加具体的日期和数字，证明西伯利亚与俄国的气候差别：“春天还没开始。丝毫也看不到绿色。树林光秃秃，雪没有全部融化；湖里还有颜色混浊的冰。五月九日，圣尼古拉节，来了一阵严寒，今天是十四日，却下了

^① Marquis de Custine, *Journey for Our Time: The Russian Journals of the Marquis de Custine*, trans. Phyllis Penn Kohler, Chicago: Henry Regnery, 1951, p. 241.

^② See James R. Gibson, “Paradoxical Perceptions of Siberia: Patrician and Plebeian Images up to the Mid-1800s”, in Galya Dirnent and Yuri Slezkine, eds., *Between Heaven and Hell: The Myth of Siberia in Russian Cul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3, p. 74.

一俄寸半的雪。”（《契》15：56）寒冷冻住的不只是人的身体，也禁锢了人的灵魂，渗透进西伯利亚人的意识，获得了除物理以外的形而上学意义，成为特写的主旨意向之一，这不能不给俄国读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标志西伯利亚不同于俄国的“反常”的第二个意象是“蛮荒”，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人居住，人迹罕至，缺乏人的劳动和文化的改造痕迹；二是野生动植物的繁多和大自然的雄伟力量，以及人类和人的一切作为在强大的自然界压迫下皆“微不足道”的压抑体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旅行者眼里，由于人在如此广漠的荒野面前无能为力，西伯利亚奇迹般地保持了自然的纯洁，成为从未被人力触碰过的“遗失的世界”，让人联想到传说中的福地“白水国”（Беловодье）或者“基捷日城”（Китеж-град），从而呈现出“西伯利亚时空体的道德评价要素”^①，为陷入欧洲文明危机的俄国甚至世界保存了精神复活的圣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西伯利亚文本中，“阴暗的西伯利亚是一道门槛，使主人公身处永恒的〔《圣经》般的〕和原初的光明生活的边缘，在其后应当开始‘人的再生’、‘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历史’”^②。但也正因为西伯利亚被视为独特的道德和社会的乌托邦，这两位作家在描写西伯利亚空间时偏重强调文化意义浓厚的象征符号和过于饱满的宗教神秘主义光环，而常常忽略了现实经验层面的具体细节。契诃夫在处理西伯利亚空间时延续了经典文学的精神文化传统，即保持和发展“西伯利亚—俄罗斯”这一格局宏大的问题域的哲学反思，但同时他也在唯物主义土壤上建立起经验主义的时空关系，在服从情节逻辑的基础上，以实际观察呈现西伯利亚空间里体现“蛮荒”的现实填充物：

不过另一方面，我有生以来却从没看见过这么多的野禽。我看见野鸭子在旷野上走来走去，在水洼里和路旁的水沟里浮游，几乎就在马车旁边扑棱梭飞起来，懒洋洋地飞到桦树林里去了。在寂静中突然响起一种熟悉的、好听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在头顶上不高的地方有一对仙鹤，于是人的心情不知什么缘故变得忧郁了。后来又飞过一些野鹅，又飞过一长串像雪那么白

^① Гудкова Е. Ф., *Хронотоп Сибири в рус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VII—XIX вв.*, <http://guuu7.narod.ru/HS.htm> [2019-02-20]

^② Тюпа В. И., “Мифологема Сибири: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ибирском текст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in *Сибирский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 1 (2002), с. 32.

的、美丽的天鹅……到处都有鹬鸟在呻吟，海鸥在哀叫……（《契》13：3）

这段描写的开头“有生以来却从没看见过……”仍然强调西伯利亚空间与旅行者过去所处的空间环境的显著差别，而“野禽”这个词本身的语义也揭示出西伯利亚空间的荒无人烟。同时与旅行者发生关联的是，这些野禽似乎根本不知道人的存在，也不害怕人，于是自然而然地引发了“打猎”的欲望，暗示了猎人的潜在在场，由此打猎主题在系列特写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篇特写末尾描写了在西伯利亚打猎的现实情况：“在西伯利亚没有任何打猎的规章，人们一年四季射猎飞禽，可是这儿的野禽未必会很快就灭绝，在秋明到托木斯克的一千五百俄里路程中野禽很多，然而像样的枪却一支也没有，并且一百个猎人当中只有一个会射击飞着的鸟。”（《契》13：17）最后一篇再次提到打猎，但指明猎手的身份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定居农民：“按马车夫的说法，原始林里有着熊、狼、驼鹿、黑貂、野山羊。住在大道旁边的农民们遇到没有活干的时候，就在原始林里一连消磨几个星期，在那儿射猎野兽。此地的猎术是很简单的；要是枪响了，那就谢天谢地，要是枪不发火，那就别想博得熊的仁慈了。”（《契》13：43）在旅行者眼中，西伯利亚的猎人和他们的寒酸装备在“蛮荒”的环境中显得十分弱小，因而尽管大自然在他们的前面展露出自己的财富，但人却对这笔馈赠无能为力，配不上西伯利亚蕴藏的无穷潜力。可是，猎人的潜在在场，以及猎人身份的人类学涵义，终究暗示了征服西伯利亚荒野空间的可能。

契诃夫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忠实拥护者，力图把旅行叙事建立在真实的观察和既有的知识体系之上，然而西伯利亚自然环境并没有提供类似证据，可以支持把该地区的自然物种表现为被研究和利用的物质对象。相反，刚刚踏足异域空间之时，过去只能从书本了解东方的俄国旅行者看到的情况却是：原始的荒野之地压抑人的主动精神，直至排除了人的存在，而缺乏人的自然也失去了生命和灵魂，这一点鲜明地反映在旅行记中富于异质空间接触象征意蕴的夜晚渡河场景中：

好冷啊！没有一所住房，没有一个行人……在阴暗的空气里，没有一样东西在动，没有一点响声，只听得见马车碰响冻结的土地，只有在人点烟的时候，路旁才有两三只鸭子被火光惊醒，张开翅膀飞起来……我们来到了河

边。必须摆渡到对岸去。岸边一个人^①也没有。《契》13：5—6）

在描绘另一种具有划分和征服空间意义的象征物“道路”时，契诃夫又一次强调人的缺席：

在西伯利亚大道上，从秋明到托木斯克，一路上没有一个市镇，没有一个田庄，只有一些大村子，彼此相距二十、二十五以至四十俄里，路上没有遇见庄园，因为这里没有地主，您见不到工厂、磨坊、客店……路上唯一使人想起人类的东西，就是迎着风吼叫的电报线和里程标。《契》13：12）

这里提到的“市镇”（поселок）是俄国中部地带的乡村组织形态，“田庄”（хутор）是俄国南方大草原和乌克兰特有的彼此独立的地主田产，相比之下西伯利亚的“大村子”（слобода，源自俄文词“自由”[свобода]）与传统的原始村社类似，是十七世纪起俄国移民“从越来越重的农奴制枷锁下逃离并在西伯利亚寻找解脱”^②时形成的松散的农户聚居地，而“电报线和里程标”这些欧洲文明的标志物则表明，尽管旅行者强调他需要克服原始自然，但其实并未走出俄国殖民地的基础设施的范围。因此“人的缺失”更像是蛮荒的西伯利亚在向人提出要求，呼吁俄国人能够承担起开发异域空间的文明使命，并能观察、发现和欣赏这片大自然的美。

比较契诃夫在旅行途中写给家人的私信和发表在《新时报》上的特写，可以看出特写中似乎有意为之的“疏漏”。在写给妹妹的信里，契诃夫说他从卡马河到西伯利亚一路上“常常遇见异族人。鞑靼人很多……”，评价鞑靼人“是一个可敬的、谦虚的民族”（《契》15：48），“在西伯利亚，他们‘比俄罗斯人好’”（《契》15：61）；他也“常遇到一八六四年从波兰发配到这儿来的流放犯。他们是些待客殷勤，彬彬有礼的人”（《契》15：61）。事实上，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西伯利亚土地上仍居住着哈萨克人、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和鞑靼人等多个土著民族，人口达到134.5万^③。可是在系列特写中，契诃夫却对有过亲身交往并且

^① 原文为 душа，俄文中也表示灵魂，即果戈理的《死魂灵》书名所用之词。

^②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Шунков В. И., гл. ред.,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ё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В 5 т., т. 2.* Л.: Наука, 1968, с. 118.

^③ 详见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96页。

契诃夫《寄自西伯利亚》：将西伯利亚“写入”俄罗斯

不乏好感的土著民族和其他族裔的欧洲移民一字未提，故意为报纸读者制造出西伯利亚在俄国人到来之前荒无人烟、无人占领、无历史记载、无社会性叙事的纯粹静态的景象。虽然有人在活动，可是在西伯利亚浩瀚无际的原始森林里，包括俄国人在内的一切人为努力都不会带来任何改变，西伯利亚的广大空间仿佛吞噬了时间的运动：

在松树旁边有一个逃犯慢腾腾地走着，身上背着背包和小锅。同广大的原始林相比，他的罪行、他的痛苦以及他本人都显得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啊！他会在此地的原始林里死掉，而这是毫不奇怪、毫不可怕的，好比死了一只蚊子一样。在没有稠密的居民以前，原始森林是强大有力、不可战胜的。（《契》13：42）

契诃夫没有像柯罗连科等作家那样，对西伯利亚的流浪汉和逃亡者做浪漫化处理，但对他们面对自然界时的无助表达了同情。同时，契诃夫还举一位学者的事迹为例，证明俄罗斯的科学既没有征服、控制、占有西伯利亚的野心，也缺乏对大自然造成破坏的能力和手段：

有一个学者在来到东岸的时候无意中点燃了树林，一刹那间，凡是看得见的大片绿树都被火焰吞噬了。那个学者被这种非同寻常的情景震动了，就把自己叫做“可怕的灾难的祸首”。然而对广大的原始林来说，区区十俄里算得了什么？如今在原来起火的地点一定长出了密不通风的树林，在那里面大熊正在安然散步，榛鸡正在飞翔，这个学者的工作在自然界留下了比那个把他吓坏的大灾难多得多的痕迹。人类通常的标准在原始林里是不适用的。（《契》13：43）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伯利亚旅行的实际经验后，知识获得了更新的叙事者终究看到了“学者的工作”在大自然留下的“痕迹”。与主人公的科学观成长过程相应的是，虽然契诃夫在整个系列的特写里都故意淡化俄国科学、工业、贸易、殖民的成果，但他同时又让它们仿佛幽灵般隐隐在场，刺激着欧洲读者的想象力。这又暗示着“西伯利亚—俄罗斯”这两个相互对立的空间依靠人的努力已然建立起含义深远的联系，而来到西伯利亚的俄国人被期望起到关键作用。叙事者感叹

说：能够舍弃故乡来到西伯利亚，“这只有不平凡的人，英雄，才做得到”（《契》13：5）。从第一篇特写开始，作者对英雄主题的思考贯穿整个系列，他看待人的观念在西伯利亚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虽然这变化仅仅存在于旅行者—叙事者的意识里，但仍是对俄国欧洲部分的读者的呼吁：欧洲读者应该成长为空间的意义中心，应该为荒野带去生机和文明。西伯利亚为俄国人施展全球性的进步力量提供了舞台，而文明则是人对自身活力的释放。出于对人的能力的认知和信任，系列特写的结尾响起了乐观主义的胜利音调，当然这里的“人”只限于自愿或被迫移民西伯利亚的俄国人，因为只有他们才享有如下特权：跨越欧亚边界，积累进一步运动的能量，并根据西伯利亚的自然条件修正立场，克服本体论的孤独，书写西伯利亚的现状和前景，使自己与异域空间融合，并且最终无限地更新自己的个性。

四、文本裂隙中的个性更新

如果说与私人书信相比，契诃夫的特写文本故意“疏漏”人在西伯利亚的存在（不仅没有西伯利亚土著，连来到此地的俄国人也仿佛被蛮荒的空间吞没），那么，在系列特写内部，在评价人的问题上，却有两处造成文本“裂隙”的“反转”。

一处是关于西伯利亚的邮差。在第二篇特写里，旅行者—叙事者的马车被迎面而来的邮车撞翻，闯了祸的邮差从邮车上跳下来破口大骂，作者把他们称为“野蛮的……匪徒”（《契》13：10），无法忍受这些人的粗言秽语：“必须耗费多少的机智、恶毒以及心灵的污秽才能够想出这些卑劣的字眼和语句来存心侮辱和玷污人们认为神圣、珍贵、可爱的一切东西啊！”（《契》13：10）而第八篇特写在踏上“全世界最大的而且大概也是最不像样子的”西伯利亚大道后，叙事者对在这条艰苦道路上来回跋涉、承受巨大痛苦的邮差转而产生深刻的同情，称“他们是祖国固执地不肯承认的英雄”（《契》13：35）。此处的英雄呼应第一篇特写里对移民的看法，但对英雄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

另一处是对西伯利亚妇女的评价。在第三篇特写里，契诃夫按照“巡回展览画派趣味”^①，刻画了一位年轻的西伯利亚妇女的肖像：“女主人是一个二十五岁上

^① Кубасов А. В. , “Сибирь и после Сибири: этический и эстет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А. П. Чехова”, in Комаров С. А. , отв. ред. , *Извне и изнутри Сибири : А. Чехов — А. Вампилов — В. Шукшин* , с. 156.

契诃夫《寄自西伯利亚》：将西伯利亚“写入”俄罗斯

下的女人，又高又瘦，脸容善良而温和，正在一张桌子上揉面，早晨的太阳照在她的眼睛上、胸脯上、胳膊上，好像她把太阳光揉进面里去了。”（《契》13：14）在此，契诃夫特意插入了一段可用于短篇小说的情节：一位来自鄂木斯克的女市民把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遗弃在这户人家里，于是女主人和丈夫便将孩子当成自己亲生骨肉一样抚养。当孩子啼哭时，她就跑过来，一边摇着摇篮，一边“温和地微笑着”（详见《契》13：14）。这些画面是温暖的，充满爱意的，令人产生好感：

多好的人啊！我喝着茶，听他们讲萨沙的时候，我的行李一直放在门外的马车上。我问起会不会有人偷去，他们却微微一笑，回答说：

“这儿有谁来偷呢？我们这儿夜里都没有人偷东西。”

确实，在这整条大道上一直没有听说过行人的东西被人偷去。在这方面，此地的风气好得很，有着优良的传统。（《契》13：16）

不仅如此，西伯利亚人制造的物品消除了西伯利亚与俄罗斯之间的根本对立，使得旅行者—叙事者想起了自己的故乡——俄国南方：“白面包的味道和形状使人联想到塔甘罗格和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乌克兰人在市场上卖的那种松软的黄面包圈。”（《契》13：16—17）

可是到了第七篇特写，叙事者对西伯利亚的女人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极其刻薄的判断：

这儿的女人跟西伯利亚的大自然一样乏味，她们缺乏光采，冷淡，不会装束，不会唱歌，不会笑，模样儿不招人喜欢，像一个老住户跟我谈话时所说的，“摸起来硬邦邦的”。等到西伯利亚逐渐产生自己的长篇小说作家和诗人，那么，在他们的长篇小说和诗篇里，女人不会做主人公，她们不会鼓舞人、激发人去进行高尚的活动，不会拯救人，走到“天涯海角”去。（《契》13：30—31）

这篇具有政论色彩的思考流放和惩罚制度的特写，描绘了由于空间的封闭而形成的人的精神绝境，而且这一绝境并非凭空想象，而是现实中流放西伯利亚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就在当时，第七篇特写中契诃夫关于西伯利亚妇女“缺乏光采”的评价刺痛了西伯利亚本地知识分子的情感，他们指责契诃夫对西伯

利亚妇女做了错误的论断。^① 亚德林采夫在他主编的《东方瞻评》上化名“好心肠的西伯利亚人”发表小品文说：契诃夫归根结底是从首都来观光的“游客”（而非旅行者），因此只是力求让自己的旅行书写为首都读者提供某种新鲜的东西，在这方面他与“《新时报》的记者们尽心竭力地追逐缺乏思想和立场的标新立异”^② 并无二致。甚至两年后，《东方瞻评》副刊《西伯利亚集》上还有一位作者无法原谅契诃夫，在题为《俄国报刊论西伯利亚》的文章中提及契诃夫对西伯利亚妇女的“侮辱”，判定作家的过错在于“对当地居民的歪曲认识”^③。

但就笔者目前所见资料，无论是当时的批评家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对于契诃夫看待西伯利亚妇女和邮差的前后矛盾，都没有给出解释。如果说是因为旅行者在由西向东沿途见到了不同的人，因此写出了不同的印象，那么系列特写的写作过程本身就会推翻这一可能。前六篇特写是契诃夫在托木斯克停留时集中写作的，回顾了从秋明到托木斯克之间的行程，而第七篇特写实际上与旅途本身并没有直接联系，其中对西伯利亚妇女的负面评价是契诃夫对“西伯利亚—俄罗斯”整体思考的总结。第八篇特写中的西伯利亚邮差得到叙事者的高度赞扬，这是他观察“从彼尔姆到伊尔库茨克那样一段路上”的结果，第二篇特写中的叙事者与邮差的冲突就发生在这条路上，但同样的“匪徒”却变成了“英雄”。在同样的地方见到了同样的人，却在同一系列的作品里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评价，该如何解释这种前后反转的文本“裂隙”？也许只能做这样的假定，即通过西伯利亚的旅行，契诃夫笔下的旅行者—叙事者的个性得到了更新，评价人的眼光发生了改变。因此文本里对邮差的先贬后褒和对妇女的先褒后贬，就应该联系叙事者个性的变化进行解释，而这就需要联系契诃夫作为欧洲科学考察活动的实践者采用了什么样的新观点来看待“西伯利亚—俄罗斯”的空间对立。

俄国文论家秋帕在其奠定西伯利亚文本的神话诗学研究路径^④的论文《西伯利亚的神话题材》中，引用人类学家杰内普定义的更始仪式^⑤的考验——通过仪

① See 〈безым.〉, “Хроника Сибирской жизни”, in *Восто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No. 39 (1890), с. 5.

② Добродушный Сибиряк, “Вдоль да по Сибири”, in *Восто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No. 37 (1890), с. 8.

③ Qtd in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гл. ред.,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ибири*, с. 490.

④ See Анисимов К. В., “От редактора”, in Он же, отв. ред., *Сибирский текст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сюжет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с. 3.

⑤ инициация, 英文为 initiation, 通常译为“成年仪式”, 意指人从自己原有的状态中分离出来, 进入边缘或转换的阶段, 通过特定的考验后获得新的稳定状态。在人类学话语中, 这一术语并非单指今天大众语境中的成年礼, 而是强调人对自身原有身份的改变和重新开始, 以及地位升迁、正式履职等含义, 故笔者取其本意直译为“更始仪式”。

式 (rites of passage) 的阈限阶段 (liminal phase) —— 来阐释西伯利亚空间，人在这一恐怖国度的居处被命名为“象征主义的死亡阶段”，然后他再以成年男人的新的社会身份返回结构性的社会。研究者举出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新身份：一个是“猎人”（前文提过，契诃夫一直关注猎人在西伯利亚的潜在在场），另一个是“战士”（前文也论述过俄国军事征服者和探险家作为战士对西伯利亚的重要意义）。秋帕进而认为，西伯利亚的苦役犯和流放犯在这一边缘空间结成了人类学家特纳所谓的“交融”的共同体 (communitas, 或译为“共睦体”)，此时处于阈限阶段的边缘人“失去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身份，蒙受‘暂时的屈辱和混乱、社会关系未形成结构的状态，这种状态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本质的和亲密的联系，没有这样的联系，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思议的’”^①。

从契诃夫特写中旅行者—叙事者在西伯利亚的经历和与此相联系的心理变化来看，他的个性更新符合人在更始仪式中所发生的转变。特纳在《仪式过程》中指出：

阈限或阈限人的特征不可能是清晰的，因为这种情况和这些人员会从类别（即正常情况下，在文化空间里为状况和位置进行定位的类别）的网状结构中躲避或逃逸出去。阈限的实体既不在这里，也不再那里；他们在法律、习俗、传统和典礼所指定和安排的那些位置之间的地方……阈限常常是与死亡、受孕、隐形、黑暗、双性恋、旷野、日食或月食联系在一起。^②

如前所述，契诃夫笔下的旅行者—叙事者踏上西伯利亚土地被类比为死人进入黑暗而又空旷的地狱，他的医疗技能和医生权威遭到了轻视和忽略。随着向东方的深入，契诃夫笔下的旅行者—叙事者也发生了与周围西伯利亚人在阈限阶段的“交融”。开启全部特写的是这样一段对话：“‘为什么你们的西伯利亚这么冷？’‘上帝的旨意噢！赶马车的人回答说。’”（《契》13：3）这一对话直截了当地表明即将踏入的土地是由神意安排的经历暂时磨难的更始仪式空间，具有阈限的神圣性和巫术功能，原先的世俗身份和技术性知识（欧洲医学）在此都将失效。在第一篇特写里，

^① Тюпа В. И., “Мифологема Сибири: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ибирском текст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in *Сибирский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No. 1 (2002), с. 28.

^② 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5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仪》”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为主人公赶马车的车夫无名无姓，叙事者有时候叫他“我的马车夫”，有时候叫他“老人”。对叙事者而言，这位车夫并非是一个有着个性特点的人，只是代表西伯利亚人的一个符号，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叙事者才能摸索到西伯利亚人的内心秘密；而叙事者本人作为阈限的“初次参与者”（*initiant*）同样无名无姓，也以平等的身份进入了更始仪式的程序。虽然在第一篇特写里车夫还称呼他“老爷”，但遇见的渡船工人已经“看不出来我是‘老爷’了”（《契》13：7），甚至有一个划桨人直接把“老爷”当作车夫来喝骂：“喂，你，毒疮，干吗站在那儿嬉开嘴巴？把拉边套的马卸下来！”（《契》13：7）叙事主人公一阈限人遭遇到更始仪式里必然经历的羞辱和摧残，从原有的社会高位体验到身处低位的滋味：“他们就像是被贬低、被碾压，一直到大家的境况都完全相同了，再重新被塑造。”（《仪》：96）阈限阶段的初次受礼者的特点是“顺服和沉默”，他必须顺从阈限空间的规则，接受仪式的教导，承认自己对于阈限语言的无知：“他们想说的是什么样的毒疮，我虽然也问过，却没有弄明白。”（《契》13：7）在人类学视野中，阈限者通过更始仪式的考验是“进入死人的王国，而这个王国的主宰一般是动物图腾”^①，因此俄国旅行者还放弃了自己原先的语言，学习神话学意义上的语言，像动物一样吼叫：“痛得叫喊，哭泣，召唤人帮忙，总之，发出叫声，在此地就叫做吼，所以在西伯利亚不光是熊吼，就连麻雀和老鼠也吼……我们就开始吼。”（《契》13：6）

阈限交融使得叙事者一阈限人克服了孤独、隔绝的情绪（“我感觉到一种难于描摹的孤独”〔《契》13：10〕），与周围的西伯利亚人建立起平等、友爱和互助的和谐关系。在第二篇特写里，接替前两位无名老人运送主人公的车夫，不知不觉已经换成了一位有确定的名字和父称的农民“伊利亚·伊凡内奇”，后者主动拉近了西伯利亚人与欧洲人一叙事者之间的距离：他没有称呼“我”“老爷”，而是“拉着我的衣袖说：‘起来，朋友，马车备好了’”（《契》13：11）。自此，俄国旅行者与当地有了积极的交往与合作。在第四篇特写里，出现了一位向导，他是“一个留着胡子的农民，手里拿着一根长树枝”，这样的形象“令人想起《圣经》里引路的先知”^②，他“开始给我们引路……沉默地向前走”，主人公只能顺

^① Тюпа В. И. , “Мифологема Сибири: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ибирском текст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in *Сибирский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No. 1 (2002), с. 28.

^② Баханек С. Н. , “А. П. Чехов-драматург на пути к циклу очерков «Из Сибири»”, in Комаров С. А. , отв. ред. , *Извне и изнутри Сибири: А. Чехов—А. Вампилов—В. Шукшин*, с. 138.

从地“跟着他走”（详见《契》13：19）。

精神交融的顶点记录在第五篇特写中，此处走来了一位拥有“人牛”神话学外形的西伯利亚人彼得·彼得罗维奇，“他生着牛样的很宽的后脑壳”（《契》13：22）。这样的长相令人想起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迷宫的主人——人牛米诺陶洛斯^①，在《奥德赛》、《埃涅阿斯纪》和《神曲》中，米诺斯担任审讯并依罪发落死人的冥界判官。如同更始仪式神话空间的主宰，这位彼得·彼得罗维奇在言谈中也表现为一个判官，能够宣判人的罪孽：“至于说到上帝……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是不得了的大事，可是这位主人躺下来，光是在脑门上画三回十字，好像这就足够了，他多半赚了钱，把钱藏起来……可是他该问一问自己：这都是为了什么？要知道你总不能把它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啊！”（《契》13：24）他还自信有权力可以施加惩罚：“明天我就能把这个主人整一下：他就会在监牢里死掉，他的孩子就得到外头去讨饭，而且根本没有什么王法来治我，也不会有人来保护他……”甚至开始审理人的灵魂，对西伯利亚人的精神状况做了沉痛的公诉：

这儿，在西伯利亚，都是些愚昧无知的、没有才能的人。从俄罗斯给他们运来短皮袄啦，花布啦，碗碟啦，钉子啦，他们自己却什么也不会做，他们光是种地，干私人拉马车的活儿，别的就没什么了……就连鱼也不会捕。这是些乏味的人，上帝保佑，多么乏味啊！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你只会浑身发胖，胖得没边，至于对你的灵魂，对你的头脑，那可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瞧着他们都觉得可怜……他们白白地埋没了，于人一点好处也没有，就像苍蝇一样，或者，比方说，像蚊子一样。（《契》13：24）

彼得·彼得罗维奇拥有与俄国旅行者一样宏伟的“西伯利亚—俄罗斯”空间格局（“您是从俄罗斯来的吧？”[《契》13：22]），但意味深长的是，恰恰是这位西伯利亚的“判官”向旅行者提出了“寻找真理”的问题，而且认为答案就在俄罗斯。因此，包括特写作者和读者在内的俄国人，有责任为西伯利亚运送有关上帝、生活和“另一个世界”的真理，就像俄国为西伯利亚运送“短皮袄、花布、碗碟、钉子”一样。作为处在阈限中的俄国人，旅行者否认在俄罗斯的人就知道真理，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西伯利亚人提出的必须按照真理而生活的观念，并且为

^① 这个名字来源于克里特岛国王，宙斯之子米诺斯。

俄国人醉生梦死、未能承担起为西伯利亚输送真理的使命而痛惜。因此契诃夫后来在《第六病室》、《我的一生》(1896)、《醋栗》等小说作品中,反反复复对俄国内地城市发出与彼得·彼得罗维奇类似的判词。在戏剧《三姊妹》中,安德烈最后的独白既是对远离文明之光的外省城市的尖锐批判,也是对自己放弃科学志向(这一点至关重要)的痛切忏悔:

我们的城市已经存在二百年,有十万居民,可是其中没有一个人跟其余的人有什么不同;过去也罢,现在也罢,没有一个建立丰功伟业的人,没有一个学者,没有一个艺术家,就连一个稍稍出众因而惹人羡慕或者使人产生模仿的热烈愿望的人也没有……大家光是吃饭,喝酒,睡觉,然后死掉……另一些人出生,也还是吃饭,喝酒,睡觉……无法抗拒的庸俗影响压制着孩子们,神圣的火花在他们的身上熄灭,他们变得像他们的父母那样渺小可怜,彼此相仿,就跟死人一样……(《契》13:341)

拉祖莫娃敏锐地发现,在这第五篇特写里发生了与契诃夫最喜爱的短篇小说《大学生》(1894)类似的情节解扣。^①在小说里,年轻的大学生用《福音书》里的故事打通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结尾处他爬上一座小山,欢欣鼓舞地想到:“过去同现在……是由连绵不断、前呼后应的一长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真理和美过去……指导过人的生活,而且至今一直连续不断地指导着生活,看来会永远成为人类生活中以及整个人世间的主要东西。”^②如果说真理可以连接起现在和过去的时间,那么在这篇特写里,西伯利亚人向俄国要求真理则把“西伯利亚—俄罗斯”这一组对立空间连接起来。此处的精神交融和随后第六篇特写中记载的与西伯利亚人同舟共济的渡河事件,最终完成了主人公—叙事者在更始仪式中的个性更新,确立起新的本体论空间模型,这种模型不是悲剧性的,而是积极的,乐观的,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它克服了孤独和死亡的观念,促成了最后三篇特写中叙事者树立的科学志向和与之相关的以“科学之眼”(“以知识和经验为基础”)来观看西伯利亚人时出现的“反转”。这里蕴藏着文本出现“裂隙”的原因。

从十八世纪开始,包括俄国人在内的欧洲科学考察者对全球地理空间和自然

^① See Разумова Н. 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П. Чехова в аспект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с. 168.

^② 《契诃夫小说全集》(第9卷),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09页。

生态进行分类整合的“科学之眼”，正是“有文化的、男性的、欧洲人的”（《帝》：40）眼睛。在第三篇赞美西伯利亚妇女的特写中，处在消除差别的阈限空间中的主人公表现为一个缺乏性区分、性能力和压抑性意识的青春期男孩，在看待西伯利亚妇女收养和照顾婴儿这件事上，他的半色情半压抑的眼光暴露出天真的恋母幻想：“早晨的太阳照在她的眼睛上、胸脯上、胳膊上，好像她把太阳光揉进面里去了”（《契》13：14）；“女主人说着，塞给娃娃一个奶头”（《契》13：15）。这家人对旅行者寄予厚望，请求他指点收养孩子的办法，但旅行者表现出十足的无能为力，随后还胆怯地打听此地的偷窃和抢劫案件（“我非常害怕路上遇见的流浪汉”[《契》13：16]）。正如普拉特所说，落入野蛮环境中的欧洲人在使自己显得幼稚和软弱的自我表述中，包含“以自我为中心的渴求和欲望的语汇”（《帝》：73），隐藏着文明世界里成年男性所拥有的科学意志和征服潜力。在父权结构社会中，妇女一直处在父亲和丈夫的权力之下，但在西伯利亚阈限空间里，由于男人受到法律制裁，落到了从属地位，妇女因而被赋予了家庭主导角色。但也正是在阈限人对妇女的赞美中，欧洲探险家凭借其天真无辜和软弱无助，实施了一次反征服。

同时，更始仪式中发生状况和地位转换的阈限人也是遭到粗暴对待的“弱者”，他必须谨守“各种耐心和谦卑的样式”（《仪》：102）。在描写与邮差冲突的第二篇特写的开始，刚刚进入更始仪式的死人王国的主人公看到与但丁笔下类似的地狱前兆：在潮湿的草地上“蛇形的野火”（《契》13：8）伸展蔓延；在《神曲》中，在那铅灰色的沼泽上，冥河船夫卡隆的眼里也“辐射着愤怒的火焰”^①。周围的地狱场景，使得主人公—叙事者面对邮差的破口大骂时，感觉自己作为阈限人的软弱无力：“在夜间，在黎明之前，在这群野蛮的、破口大骂的匪徒当中，在远远近近那些点燃干草，却一点也没有烘暖夜晚寒气的野火的景色中，在那些惊慌不安地挤在一起、不住地嘶鸣的烈马旁边，我感觉到一种难于描摹的孤独。”（《契》13：10）在更始仪式中，只要有人认定曾被阈限人冤枉过，他就有权尽情辱骂这个接受考验的人，把自己的怨恨全部倾泻出来（详见《仪》：102）。契诃夫在作者插话中解释说，西伯利亚邮差骂人的话是从流放犯那里学来的，因此这里宣泄的仇恨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那些流放犯在俄国的欧洲部分经历审讯和判决，被所谓的文明和法制驱逐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且永无返回家乡的希

^①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18页。

望。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他们备尝饥饿、寒冷、疾病的折磨，遭受各级官吏的鞭打、欺骗、侮辱，对给他们带来无穷痛苦的俄国社会既恨又怕。身处西伯利亚的俄国旅行者自然要承受当地人的怨恨，在他返回欧洲文明重获社会身份之后必须担负起新的责任，也提前限制他滥用权力。

在总结性的后三篇特写的第一篇（第七篇）中，主人公—叙事者摆脱了前文的感伤语调，用严肃的政论文体讨论起俄国法律体系和惩罚措施的问题。他恢复了科学思考的习惯，号召采用“一种比较合理、比较适当的正确的方法”（《契》13：28）来研究西伯利亚的种种问题。此时经过更始仪式的锤炼，阉限人已经获得了文明社会中的科学考察者身份，开始重建科学理性的权威和阶层化的社会观念，而在这样的结构中，妇女曾经的主导地位终究是暂时性的改变。旅行者地位提升后回归社会的仪式性标志便是拥有稳定的性别区分和性关系（详见《仪》：104），他冷静地剥夺了妇女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里高尚的救世功能，把她们的性服务看作西伯利亚男人在苦闷无聊的环境中的例行消遣：“在漫长的秋天和冬天的晚上，流放犯……喝完两瓶白酒和半打啤酒，然后照例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到那儿去？也就是到妓院去。’西伯利亚女人与科学和精神活动绝缘，她们“不会鼓舞人、激发人去进行高尚的活动”，更不会跟随科学考察者“走到‘天涯海角去’”（详见《契》13：31），这一论断反映出科学考察者的世界的绝对男性中心主义。

随后，在描写征服西伯利亚道路的第八篇特写中，科学考察者—叙事者用成熟的“科学之眼”观看“西伯利亚—俄罗斯”的空间联系和联通这两个隔绝空间的邮差：他们将“把宗教、教育、贸易、秩序、金钱带到西伯利亚来的皮包和大袋子”（《契》13：34）装满邮车，然后就不得不与延误的航期、泛滥的河水、黏稠的泥泞搏斗，冒着生命危险用小木船渡过河流和水淹的草地，发生事故已是家常便饭。可正是这条坑坑洼洼的狭长道路，在当时就是“连通欧洲和西伯利亚的唯一血管”，“文明”正是依靠邮差们的劳动“顺着这条血管流到西伯利亚去”（《契》13：37）；于是，原先被认作“匪徒”的西伯利亚的邮差，变成了背负沉重的十字架的不折不扣的“殉教徒”（《契》13：35）。评价“反转”的背后，在文本“裂隙”之中，隐藏着评价者本人个性的更新。

契诃夫的旅行特写的末尾转向了人的专业才能的主题，描写了一位修理他的马车的铁匠：“一般说来，铁匠是有才能的人，这在原始林里特别明显，他们在此地是不会湮没在其他有才能的人群中而无人问津的……凭各种征象来看，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又是一个大酒徒。如同一个有实际经验的好医师对治疗一般的

契诃夫《寄自西伯利亚》：将西伯利亚“写入”俄罗斯

疾病感到乏味一样，他不大乐意地把我的四轮马车打量了一下，简短而清楚地作出了诊断。”（《契》13：43—44）这里把西伯利亚的铁匠与叙事者自己的职业（医生）相提并论，一方面使得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空间与俄罗斯的城市空间因为人的专业才能而统一，另一方面也暗示旅行者—闯入人重新获得了作为欧洲科学文化代表的医生权威，强调其在诊断西伯利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问题并开出专业处方，将俄国文明输送到这一野蛮空间的宏伟事业中必然具有的领袖作用：“就连在原始林里，有才能的人也像在我们大城里一样很看重自己，也一样的作风专横。”（《契》13：44）系列特写以这句话结束，既显得突兀，也意味深长。

契诃夫在西伯利亚的旅行书写，显示出十九世纪末俄罗斯科学界、文学界和沙皇政府对于从地理上征服和从文化上吸纳西伯利亚所达成的广泛共识，这种共识被一流的俄国文学家以艺术的方式整合和呈现为一种有关世界的空间秩序的神话，意图激发俄罗斯民族改造自身性格并担负“神的使命”以领导世界的欲望。《寄自西伯利亚》特写之后，契诃夫作为得到官方默许的合格的科学考察者，踏上萨哈林岛对该岛各个社会阶层的居民实施了周密细致、寻根究底的科学统计工作，并且首次记录下这个苦役之岛的人口调查的完备数据^①。不过，用契诃夫短篇小说《套中人》的一句话来说，“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作者简介] 徐乐，男，197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俄语语言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近期发表的论文有《19世纪俄国文学经典与西伯利亚——兼论西伯利亚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意义》（载《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10期）、《西伯利亚苏维埃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9年第1期）等。

责任编辑：魏 然

^① Миссонова Л. И., “К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населения Сахалина: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А. П. Чехова”, in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No. 3 (2012), с. 161.